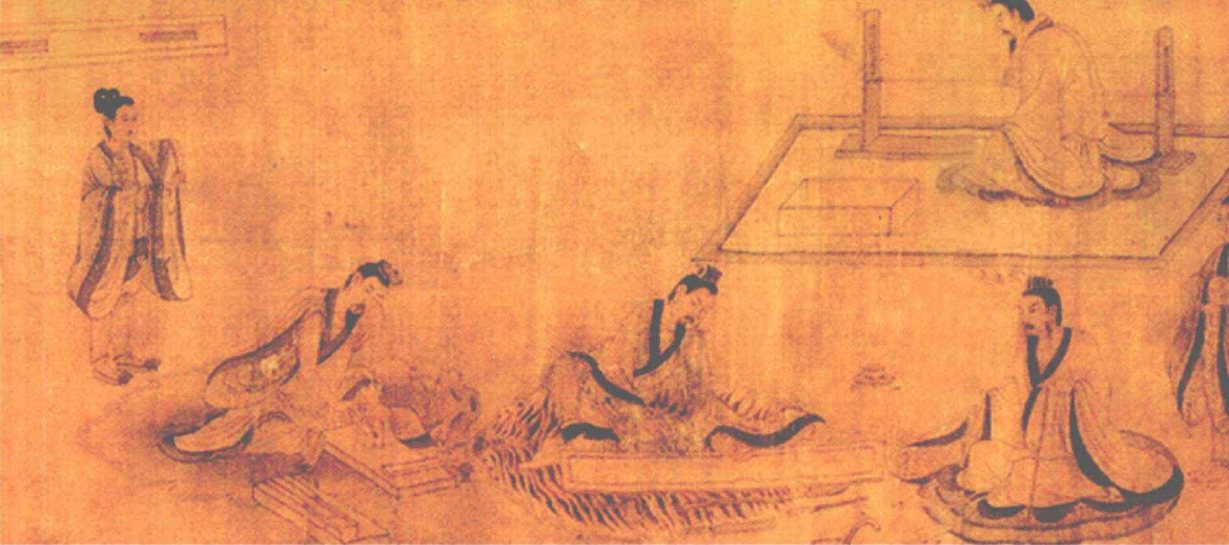




魏晋人

WEI JIN REN
NONGKUANG YI LIUBEI

弄狂以流悲

李建中 李小兰/著



東方出版社

魏晋人

WEI JIN REN
NONGKUANG YI LIUBEI

弄狂以流悲

李建中 李小兰/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装帧设计:张新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人:弄狂以流悲/李建中 李小兰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060-3845-4

I. ①魏… II. ①李…②李… III. ①士-人格-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
时代 IV. ①K235.03 D69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1612 号

魏晋人:弄狂以流悲

WEIJIN REN NONGKUANG YI LIUBEI

李建中 李小兰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1

字数:179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3845-4 定价:2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1
第一章 乱世千愁	/5
一、过江诸人的飘泊之感	/5
二、人生过客的摇落之悲	/12
三、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衽衣	/20
第二章 酒中百态	/25
一、名士徽章	/26
二、父子酒歌	/31
三、怪诞与纵恣	/36
第三章 徘徊去就	/42
一、“远志”乎？“小草”乎？	/43
二、“破甑”之恨	/48
三、失意与适意	/56
第四章 终当为情死	/62
一、自然与矫情	/63
二、真诚与矜假	/68



三、殉情与殉利	/72
第五章 心共口敌	/80
一、名士病：言语的痛苦	/81
二、说“清谈”	/84
三、“面子”面面观	/89
第六章 雅俗同体	/95
一、自古而观，岂一王戎也哉！	/95
二、歧路之泣	/99
三、雅俗悖论	/103
第七章 才性异区	/109
一、官才与文才	/109
二、德性与个性	/113
三、才性四本	/116
第八章 狂狷者的孤独	/123
一、狂狷气象	/124
二、狂者亦慎	/129
三、车迹所穷，恸哭而返	/135
第九章 有意无意之间	/138
一、无意：个体与群体	/139
二、有意：文心与人心	/141
三、之间：走不出的“竹林”	/144
第十章 奚为哉？奚乐哉？	/149
一、价值·位置	/149
二、冷落·失落	/154
第十一章 心之忧矣，永啸长吟	/157

一、慷慨独悲歌 /158

二、归去来兮！ /160

结 语 /169

注 释 /171

目

录

3

此詞人慷慨悲歌之詞，
言為程法之士，仁懷亦
言，言大將軍，係持之，
不為翻字之賢，而庸懦執
之，此詞人慷慨悲歌之詞。

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

——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引 言

20 世纪 20 年代，在广州的热天和雨天，鲁迅先生演讲“魏晋风度”，以他特有的幽默与才情，塑造“魏晋名士”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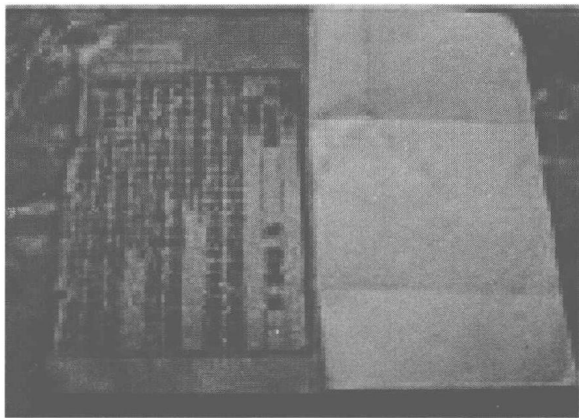
从世纪初到世纪末，中国学术界对魏晋名士的兴趣一直未减；魏晋人在不同学者的笔下，具有不同的人格形象：或谥为“恶之花”，或喻为“悲之果”，或誉为“美之最”……

有多少“魏晋名士”的研究者，就有多少种“魏晋名士”。

而中国历史上，最早给魏晋名士塑像写真，最早用灵动鲜活之语言描摹“魏晋人”之人格形象的，是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文心雕龙·知音》），翻开《世说新语》，则既能“见”魏晋名士之“面”，更能窥其“面”后之“心”。这部笔记小说，记言叙行，绘貌传神，是魏晋人人格形象的真实写照。

人格，是人的各种心理特征（气质、风度、性情、才能等）之总和；国人常说的“人格”还含有“人品”这层意思。所谓“人格形象”，是个



《世说新语》（清同治刻本）

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公开形象，它包括了人格，即主体的“外部行为”（面）与“内部行为”（心）。《世说新语》写面传心，为我们研究魏晋人格提供了真实而生动的感性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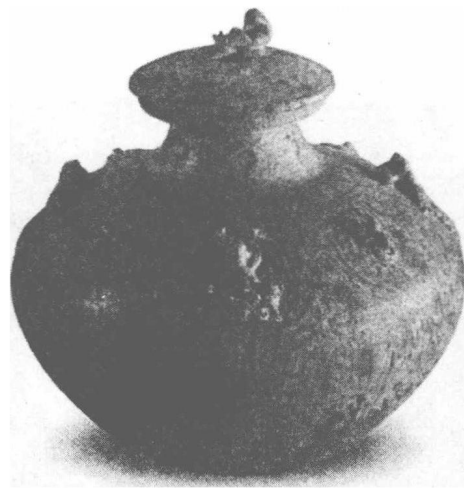
说起“魏晋人”，人们自然想起“邺下放歌”、“竹林酣畅”、“兰亭流觞”、“南山采菊”之类的风流故事；然而，若细绎《世说新语》（包括刘孝标的注），细读《三国志》、《晋书》和魏晋作家的诗文，便不难发见“魏晋风流”的背后，埋藏着无告的痛苦，那是无法消释的心理焦虑，是无计逃遁的人格冲突。比如王戎，《世说新语》的“赏誉”篇用四则文字写他的才性之美，“俭嗇”篇亦用四则写他的悭吝之丑。此种“一人两面”（或多面）的人格现象，《世说新语》中触目皆是，故“俭嗇”篇注引王隐《晋书》称：“自古而观，岂一王戎也哉！”又比如阮籍的人格形象，定型在他的诗文中，是超脱、逍遥，不与世事。细察他的所作所为，却发现他的功名之心并未泯灭。苏东坡“读”出了阮籍的人格矛盾，说他“虽放荡，本有意于世”。可见魏晋人格是一种复杂的构成，一种多重存在，其心态矛盾、人格冲突，是魏晋人人格形象的一个基本特征。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苦痛的时代”¹，也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哲学思想的多元与社会政治的专制，逼人就范的正统礼教与诱人放荡的邪说异端，统治者的双重价值与士大夫的各行其是，官场的名利与

杀夺，方外的飘逸与冷寂……外在的悖论，还原成内心的冲突；时代的苦痛酿成心灵的痛苦：烦躁、焦虑、迷茫、困惑、无所适从、无所归依……个体人格所依存的外在空间（社会）与内在空间（心灵），犹如战场中对斥的各方，作无情的厮杀。

魏晋名士的人格悲剧，是时代与个体的双重悲剧。

乱世杀夺、生命无常，使得魏晋人的生命意识陷入执著与颓唐、追寻与失落的内在矛盾之中；在伦理观念上，要张扬个性



青釉下褐彩绘盘口壶（三国吴）

要“宁作我”，而礼法名教的层层束缚，导致了循礼与违礼、崇教与悖教的心灵冲突：在处世哲学方面，超然自适、恬淡虚静的处世之道，经住世俗名利的诱惑，而衍为出世与入世的灵魂搏斗，归结为人生理想，则是一往情深的主体，在非情无情的社会中，铸成逐利与钟情、殉情与殉利的双重人格。而魏晋人的“终当为情死”，又是站在人生理想的高度，回答他们自己关于生命意识（生存价值、人生意义）的困惑。

魏晋人的人格悲剧，既在“心路历程”上演进，又在“心理结构”中发生。

对魏晋人格作“多层面”的观照，则可见出其复杂的心理构成。魏晋人，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他们往往心共口敌，言与行异；作为人中“名士”，他们趋雅逐俗、雅俗同体；作为名士中的“艺术家”，他们常常人与文异、才与性离；各层面的人格冲突，最终趋向狂慎一体，酿成人格悲剧的高潮：孤独。

“心之忧矣，永啸长吟”（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文果载心，余心有寄”（《文心雕龙·序志》）。孤独的魏晋文人，执著地寻觅自己的精神家园，并在“觅归”的路途中，精心营造出属于“自我”的艺术天地。在这片天地里，他们长啸，他们低吟，他们恸哭，他们微哂。他们啸自己的悲愤，吟自己的凄苦，哭自己的失落，哂自己的顽愚……正是在这啸吟哭哂声中，他们的悲苦与失落，化成了诗情与画意。

本书以丰富的感性材料和生动流畅的叙述,沿着“生命意识→伦理观念→处世哲学→人生理想”这一心路历程,描述魏晋名士悲剧人格的动态流变;继之在言行、才性、雅俗、狂慎等不同的心理层面,展示魏晋名士的人格建构及其悲剧冲突。在“流变”与“建构”的纵横叙述中,揭示魏晋人格悲剧的文化—心理内涵,及其对于艺术创造与美学理论的影响。

魏晋既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为苦痛的时代，又是一个美的成就极高的时代。在时代的苦痛与美的成就之间，便是魏晋名士的人格悲剧。只有深刻理解了《世说新语》时代的人格悲剧，我们才能明白美的成就之所以取得的具体的文化—心理的原因，这样就能比过去单纯社会学的理解深了一层。而《世说新语》这部魏晋人的“人格纪录”，正可以使我们深入透视那个苦痛时代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灵魂。

宗白华先生将《世说新语》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称之为“世说新语时代”²，本书则将《世说新语》所展示的魏晋人的人格悲剧，称之为“世说新语时

有言為程法之士二健疾之
變章款大將軍保持之乃
不為翻宗之賢而有惕弛之
人不愛人懷昧於憤宜無



代的人格悲剧”。这不仅是因为本书充分利用了《世说新语》的感性材料，采取了“世说新语式”的将理思蕴于感性的鲜活灵动的叙述风格；更为本质的是，本书还充分利用了《世说新语》的“美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揭橥了魏晋人格对魏晋审美文化与艺术精神的承担，揭橥了魏晋人格悲剧的苦痛与厚重对当今社会转型与人格重铸的启示。

陶渊明作《怨诗楚调》，向友人诉说自己处境的艰辛、心态的凄苦。“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一个“独”字，凸显出诗人刻骨铭心的孤寂。满腹幽愤，渴求理解；孤独的魏晋人，难觅知音！

笔者写魏晋人，为图拨开历史的烟霭，跨越时空的沟壑。这是心与心的碰撞，这是心对心的理解。

理解也是对话。这是现代人与魏晋人的对话。

一千多年了，但愿“慷慨独悲歌”的魏晋人，能在今天找到知音！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世说新语·言语》

第一章 乱世千愁

公元 220 年曹魏立；公元 420 年司马晋亡。

从汉献帝刘协被曹氏取代，到宋武帝刘裕取司马氏而代之，并非同宗的“二刘”，标示着魏晋的一头一尾。不多不少，正好二百年。

二百年的乱世！

魏晋之乱，从汉代末年便开始了。黄巾起义加上列强混战，刘氏帝国风雨飘摇，攘夺，仇隙，攻讦，屠戮，在这块灾难深重的国土上堆积着。

后人常常引用两句经典性话语，来描述魏晋乱世：一是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二是刘勰的“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我以为，真正得魏晋乱世之“深义”的，应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所展示的乱世，并非血腥扑面、剑影刀光。翻开这部笔记小说，我们看到：枯枝摇落，游子漂泊，人生过客不懈而无望地寻觅……

剑凉血热。生命的炽热与乱世的冷酷形成强烈反差，于是，愁怨悲患生焉。千愁汇一，形成魏晋人特有的生命意识：如何在生命的瞬间，追求生存价值的永恒。

这本身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困扰着 3 至 5 世纪的魏晋人，亦困扰着“魏晋”前后的中国文人。

一、过江诸人的飘泊之感

《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条：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

过江，魏晋时有过两次：除了两晋之交洛阳名士的东渡，还有魏晋之际东吴名士的西迁。尚若不拘泥于“过江”一词的字面意义，似乎可以说，魏晋人总是在“过江”。从东汉末到东晋末，名流士族，或西迁，或东渡，或戎行沙场，或避难荒郊，或羁宦异域，或求名他乡……地理位置的频繁变换，在心理上造成空间错位的凄凉。

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是魏晋文人中最早的“飘泊者”。被誉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生当乱世，长年羁留他乡。先是避董卓之乱，南下荆州依刘表。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平荆州后，王粲即归向曹操，随操征战在外，于建安二十二年死于征吴的途中。颠沛流离的生活，战乱苦寒的际遇，酿成诗人沉郁的飘泊之感与思乡之情。王粲的《七哀诗三首》其一，写他离家远去，与亲朋泣别的惨痛：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王粲的离家，除了“避乱”，还不乏“功名”之求；而曹植的离家，



出行图（魏晋彩墨砖画）

则纯粹起因于政治性迫害：其兄称帝之日，便是其弟流徙迁播之时。曹丕将曹植撵出京城，随后又三番五次地改变曹植的封地，越改越远，越改越差，以至于弄得贵为一方诸侯的曹植，连温饱也成了问题。曹植有一篇《迁都赋》，专写流播之苦：“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黄初之后的曹植，已完全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在皇帝的拨弄中，迁来徙去，居无定所，“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赠白马王彪》）。



陆机

等到司马氏代魏之后，吴郡名士便开始“过江”。晋武帝太康末年，陆机、陆云先后被迫离乡西渡，衔悲入洛。早在赴洛途中，陆机便有了漂泊之感，其诗《赴洛道中作二首》之一云：

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

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陆氏兄弟入洛后，又备尝羁宦之情。他俩去拜访刘道真，刘初见二陆，别的话不讲，只问“东吴有长柄葫芦，卿得种来否？”（《世说新语·简傲》）语气平淡，却暗含轻慢，对二陆，也是对吴国。更有甚者，西晋贵族卢子通，挑衅地问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世说新语·方正》）即便是颇为赏识二陆才藻的张华，也情不自禁地视二陆为“高级俘虏”：张华曾得意地对人说“平吴之利，在获二俊”（《世说新语·言语》注引《晋阳秋》）。

羁宦异乡十余载，陆机无时不沉浸于空间错位的悲凉之中，多少次“嗟余情之屡伤，负大悲之无力”，以至于“观尺景以伤悲，俯寸心而凄恻”（《述思赋》）。……

陆机西迁数年后，卷入“八王之乱”。王室众司马，为争皇位杀得血流漂杵。成都王司马颖讨伐长沙王司马义，命陆机做先锋。陆机兵败河桥，却被诬陷为“谋反所致”，谗陷者又是那位卢子通，《世说新语·尤悔》云：“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鸣，可复得乎？’”这一年，他才42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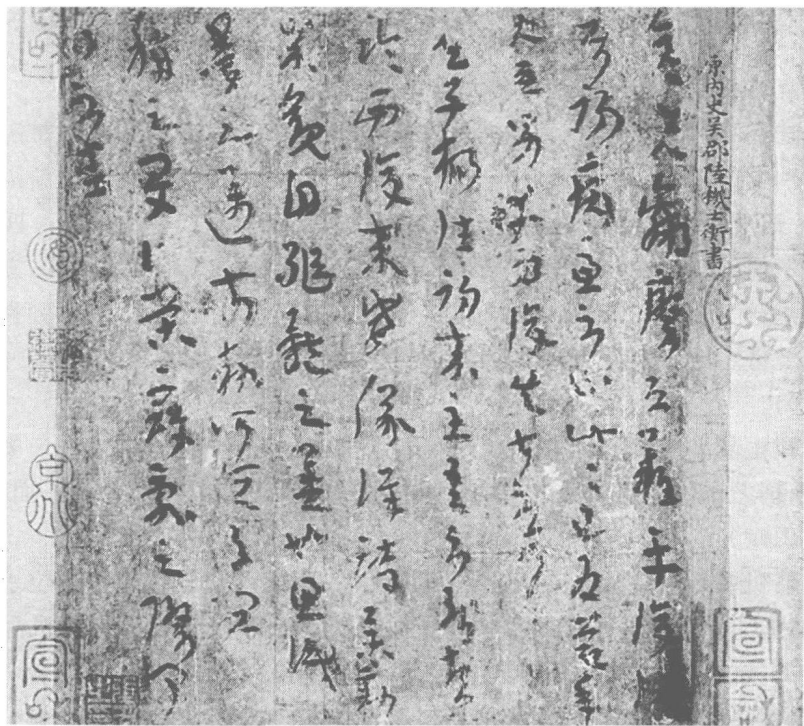
西晋卫玠，27岁便客死他乡。他是永嘉四年离乡东渡的，《世说新语·言语》云：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顿，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其“芒芒”之叹，早发于“渡江”之前。乱世游子，既是在疮痍满目的山河间流徙，更是在莽莽苍苍的宇宙中飘荡，空间错位，酿成宇宙茫茫之感。

乱世多迁徙。地理位置的频繁变换，愈来愈促使魏晋人深切地感受到宇宙的廓大辽远，所谓“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王勃《滕王阁序》）。天地之间是人。天地如此之大，人不过是其间的一粒尘埃，无足轻重。然而，恰好是这种“无足轻重”之感，驱动、激励着魏晋人固执地在天地间寻觅自身的位置。袁宏伯要外出做官了，友人都来江边为他送行——

将别，既自凄惻，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世说新语·言语》）



〔晋〕陆机平复帖

这辽阔天地，万里江山，又有多少空间属于个体的人？天地如此之大，天地又是如此之小。陆机的弟弟陆云，曾不无傲气地自称“云间陆士龙”。云间本指陆氏故乡吴地昆山一带，这里一语双关，亦指神龙飞翔之云中。其实，不用说“云间”，就是尘世间，也没有陆氏兄弟的立锥之地。羁旅为宦，寄人篱下，自身得以周旋的空间是极其狭窄的。宇宙茫茫，给魏晋人以双重的心理压力：举目四顾，只觉得天地太大人太小；低首自审，又感到人生境地狭窄而天地徒然广大。“见此茫茫”，魏晋人怎能够“不觉百端交集”？空间愈阔，悲哀愈甚；悲哀愈甚，空间愈阔。“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天际间之孤帆，你飘向何处？

于是，思归了。

王粲的《七哀诗》，第一首写“别离”，后两首写“思归”：“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王粲另有一首《登楼赋》，极言其怀土思归之悲：

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

河之清，尚可俟；而故乡之归，对于王粲却只能是一个永远的梦。

吴郡顾、陆、朱、张四大名门，皆有子弟入洛仕宦。《世说新语·识鉴》：“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张季鹰够潇洒的了，思乡便归，说走就走。似不能仅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张氏之归：他是要归家，更是“归”往“贵得适意”的人生。这样一种人生，不是在他做官的洛水边，而是在长着菰菜游着鲈鱼的吴中。唯有“归”，才算是觅到个体在天地间的位置。至于他因归家而幸免于难，则纯属偶然。故“时人”的“见机”之谓，全未猜着思归者的心思，更未识着“归”之真谛。

张翰（季鹰）归家之前，与同郡顾荣有过一番互诉衷肠的交谈：

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捉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世说新语·识鉴》注引《文士传》）

天下纷纷，智者求退，于时无望，归隐山林，寻一块适意的空间，安

晉書張翰字季鷹
齊王辟為東曹掾
在洛見秋風起思
吳中菰菜羹鱖魚
脍遂命駕便歸
俄而齊王敗時人
皆謂為見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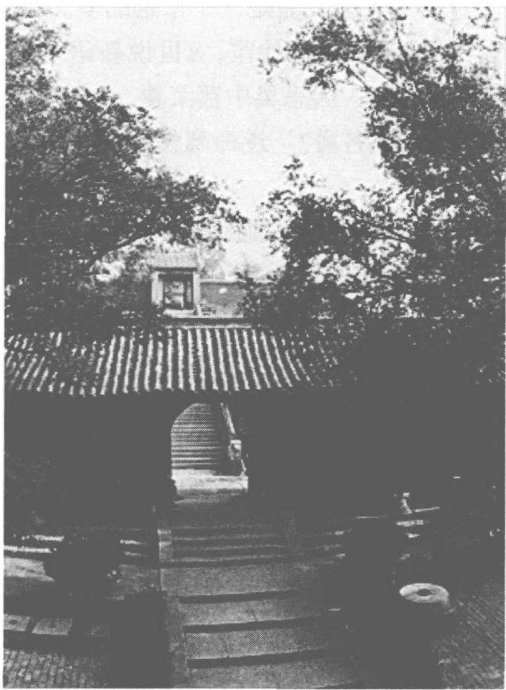
顿憔悴的身心。空间位置，并非仅仅是生存之地，它蕴藉着丰富的人生内涵；人脚下的那一片土地，它所承载的，仅只是肉体的生命？更是一种生命意识、人生理想以及个体对生命与人生的执著。

据《晋书·陆机传》，顾荣离洛归家前，也曾劝陆机还吴，机未从。但陆机的思归之念却并未止息。从晋武帝太康末年（289）离乡入洛，到晋惠帝太安二年（303）惨死异邦，15年间，其乡关之思无时不萦绕于陆机心头。陆机在洛有诸多思乡之作，如《怀土赋》、《思归赋》、《吴趋行》、《门有车马客行》等。其《怀土赋》有序，直抒诗人思乡之情：

余去家渐久，怀土弥笃。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兴咏；水泉草木，咸足悲焉。

吴中的一草一木，都珍藏于诗人的记忆之中。走到生命的尽头，对一切都了无牵挂，把一切都已看淡，而唯一不能割舍的，是与生命相始终的乡关之恋；唯一无法看淡的，是植根于乡关之思中的空间错位之感。

陆机过早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且是在异地他乡。在异地他乡的刑场上，他想起了他的故乡——华亭！



邺城三台（河北邯郸）

故国灭亡之后，年仅二十的陆机，曾在华亭别墅隐居十年之久。据《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八王故事》，陆机在华亭，伴清泉茂林，闻鹤唳风啸，闭门读书，作文赋诗，著《辨亡论》二篇，探讨孙权之所以得，孙皓之所以亡，并盛述其祖其父之功业。又著《文赋》一篇，得为文之用心，识文章开塞之所由。

华亭，由拳城郊的那片葱郁，那芳春之柔条，那劲秋之落叶，那怀霜临云的《辨亡》，那丽藻彬彬的《文赋》……一切都成了不可追忆的逝水年

华。唯剩下一个梦呓般的意愿：欲闻华亭鹤鸣！

然而，在这黄河岸边，何处见“华亭”？何处闻“鹤鸣”？只有游子思归而不得归的无尽悲哀。

二百多年后，羁留北朝的庾子山，深刻地理解了陆士衡的悲哀。子山《哀江南赋》：“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既是叙战乱之苦，更是写乡关之情。庾信若不是有如此深切的亡国之痛、羁旅之愁，他怎能写下如此沉郁的文字：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华亭鹤鸣，岂河桥之可闻！（《哀江南赋序》）

陆机在异乡河桥，欲闻华亭鹤鸣，是要为他的魂灵觅得一个永恒的归依。

魏晋人在茫茫宇宙中寻觅空间之归依，说到底，是追求人生之归宿。然而，归宿何在？

张翰归家了，但他并未能飘然如仙地“采南山蕨，饮三江水”，《世说新语·识鉴》注引《文士传》称“〔翰〕性至孝，遭母艰，哀毁过礼。自以年宿，不营当世，以疾终于家。”不做忠臣，就要做孝子。这种“哀毁过礼”的孝子生渊，这种“不营当世”的生存环境，难道就是他“贵得适意”的人生？

季鹰死了，死在故乡。虽然，他未像陆氏兄弟做异地游魂；虽然，他枕着家乡的热土。然而，他若九泉有知，真会觉得自己找到了归宿？

被曹丕撵出京城的曹植，也曾经回过家。黄初四年（223），曹植和诸王同朝京师。读《赠白马王彪》，不难见出曹植对京师有眷恋之情，毕竟，这里有他仁慈的母后，有他被埋葬的理想。然而，重返京城给予曹植的并不是手足之情、天伦之乐，而是骨肉相残、兄弟异途：任城王彰惨遭毒手，白马王彪又不能与之同行。曹植在瑟瑟秋风中，在萧条原野上，叹息命运之悲苦、人生之艰难。

魏明帝登基后，曹植应诏入朝，又一次回到京城。母后已经逝去，做了皇帝的侄子荒淫无度，满朝权贵纵情声色，后宫嫔妃任人宰割。曹植在京城，写下两首《妾薄命》，是哀叹禁苑臣妾，亦或哀叹自己？曹植孤寂地却并无多少眷恋地告别了京城，回到他的封地。

其实，无论是繁华的京城，还是穷僻的封地，都不是曹植的“家”。曹植终其一生，都是一个漂泊者。他是被遗弃的孤妾，他是无根的蓬草，